

清代士人游幕表

尚小明 编著

中华书局

清代士人游幕表

尚小明编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士人游幕表/尚小明编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5

ISBN 7 - 101 - 04465 - 4

I . 清… II . 尚… III . 幕府—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清代 IV .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982 号

责任编辑：李晨光

清 代 士 人 游 幕 表

尚 小 明 编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24^{1/2} 印张·463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 册 定价:52.00 元

ISBN 7 - 101 - 04465 - 4/K · 1909

目 录

清代七人游幕量化分析(代序)	1
清代七人游幕表	41
征引文献	333
姓名索引	369
后记	383

清代士人游幕量化分析

(代序)

一、引言

士人游幕的盛行及其影响的深远,是清代历史上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①一书中,作者对此曾有所论述。但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进一步研究清代士人之游幕,仍然非常必要。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研究的主要是清代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人”的游幕活动,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影响相对较小的普通之“士”的游幕活动,基本上没有纳入讨论范围。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主要是通过研究学人游幕活动与他们学术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究清代学术发达的原因。因此,学人游幕活动中的一些与此主题关系不大的问题,并没有纳入论述范围,或虽有所论而语焉不详。

显然,只有将侧重点放在士人游幕活动本身,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方能使我们对清代士人游幕盛行这一社会现象得到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为此,就必须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并调整分析角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项研究在史料搜集范围上比写作《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时有明显扩张,不仅年谱、诗文等方面的资料增补了许多,而且特别增加了各省通志以及一些重要的府、州、县志中“人物”门的史料。由于清代各省通志基本上以府、州、县志为基础编纂而成,因此,本文所研究的游幕士人,无论在地域分布上,还是在地位高低和影响大小上,都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随着史料范围的扩大和分析角度的调整,原来作为《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附录的《清代游幕学人表》(未刊),已不能满足本项研究的需要。为此,作者在补充新史料的基础上,对原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除增加了数百名游幕士人外,并对原表所列栏目作了增补,使之成为一个包括幕宾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家庭状况、功名、人幕前活动、游幕经历、幕中活动、出幕后活动、资料来源等十一个栏目,基本按照游幕士人生活时代先后排列的资料集——《清代士人游幕表》。

^① 尚小明著,收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研究清代士人之游幕，牵涉的问题很多。本项研究将从总体上考察清代二百六十余年中士人之游幕，着重解决有关士人游幕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士人游幕的兴衰变化历程，游幕士人的功名、家庭状况，不同时期士人游幕活动内容的变化，游幕士人的地理流动，游幕士人的社会流动，等等。

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对大量有关史料的分析、归纳、综合来解决。而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量化分析是非常有效、重要的。这种通过大量数据和图表处理史料、分析问题的方法，不仅可以使我们对某些问题获得直观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明确的量化“可取代传统的印象式判断”，“可澄清许多历史学家常犯的模棱两可的毛病，也可解决历史学家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争论”^①。比如，大量史料表明，江浙地区是清代士人游幕的主要地区，但是，这个“主要”究竟达到怎样一种程度？在不同时期有何不同变化？只要我们对有关此问题的史料，加以量化分析，便可得到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并不是十分精确，但却是明确的、有一定说服力的。

以量化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有一点很难回避，这就是资料的缺失问题。特别是在研究发生久远的历史问题时，资料的缺失往往更为突出一些。这当中既有原始资料在流传中丧失的原因，又有研究者受各种因素制约不能获取相关资料的原因，当然，史料记载本身也常常存在一些缺陷。研究清代士人游幕，同样存在史料缺失的问题，这给研究工作的进行，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不过，对于某些问题，只要作一些具体分析，量化研究还是有其用武之地的。比如，史料中对一些游幕士人的功名状况并无记载，但是，士人对功名的热望和执着追求以及各类功名重要程度的差异，使我们可以断定，史料中缺少记载，正说明那部分士人是没有功名的，或者是最低级功名——诸生的获得者。这样，经过适当处理，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个关于游幕士人功名状况的近似的量值。

从时间跨度看，本项研究跨越清朝一代，长达 268 年，是一个长时期。在此期间，清朝统治形势和社会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士人游幕的许多方面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进行本项研究时，就必须考虑到不同时期内士人游幕可能发生的变化。为此，量化分析必须划分为若干时段来进行，这样，不仅每个时段的士人游幕状况可以得到充分重视，而且通过对各时段士人游幕状况的分析，得到关于有清一代士人游幕的综合性结论。

① [英]辛西亚·海伊(Cynthia Hay)：《何谓历史社会学》，见 S·肯德里克等编，王辛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30 页。

二、士人游幕的兴衰

——游幕士人数量变化分析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幕府发展最兴盛的时期，士人游幕之风盛行。这一点早为研究者所认可。然而，任何历史现象的产生或消亡，都不可能是突发的或瞬间的，必然有一个过程。那么，清代士人游幕兴衰变化的情形如何呢？迄今为止，尚没有研究者能够清楚、准确地作出解答，甚至连清代哪一时期士人游幕之风最盛这样的问题，也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因此，对清代士人游幕的兴衰变化作具体细致的研究，很有必要。而通过对游幕士人数量变化的统计分析，无疑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进行这一研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划分时段。一般情况下，划分的时段越多，统计结果就越准确。如果能够按年统计，就再好不过。但是，对于本项研究而言，若按年统计，则不得不对 268 个数据进行处理，这是十分烦琐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一部分士人的游幕活动并无明确的时间记载，若按年统计，则此部分游幕士人将无法纳入统计范围，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反而会受到影响。正是考虑到这些，本项研究将按下面的步骤进行：首先，以 10 年为一时段，把这 268 年划分为 27 个时段，对每个时段内的游幕士人数量加以统计，然后再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1. 可以大大简化统计量，只需要对 27 个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便可较为准确地将清代士人游幕的兴衰变化情况反映出来，而不必去作 268 个数据的统计分析。
2. 按时段统计，可使那些游幕活动无明确时间记载的士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能够通过相关资料确定其游幕时段，并纳入统计范围。因此，按时段统计，较之按年统计，覆盖面更广，统计结果自然也更能反映士人游幕的实际情况。
3. 按时段统计，可以使我们对不同时段游幕士人的数量变化情况有清楚的掌握，进而为全面分析清代士人游幕的兴衰做好准备。

在进行此项统计之前，尚有三点需要说明：

1. 本项统计的最后一个时段，为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虽不满 10 年，但仍作为一个时段。
2. 凡游幕时间较长，跨两个或两个以上时段者，于每个时段内各作一次统计。
3. 对游幕时间不明确者，根据其所依幕主就任当时所任官职的时间，以及与游幕活动有关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等相关资料，来确定其游幕时段，然后纳入统计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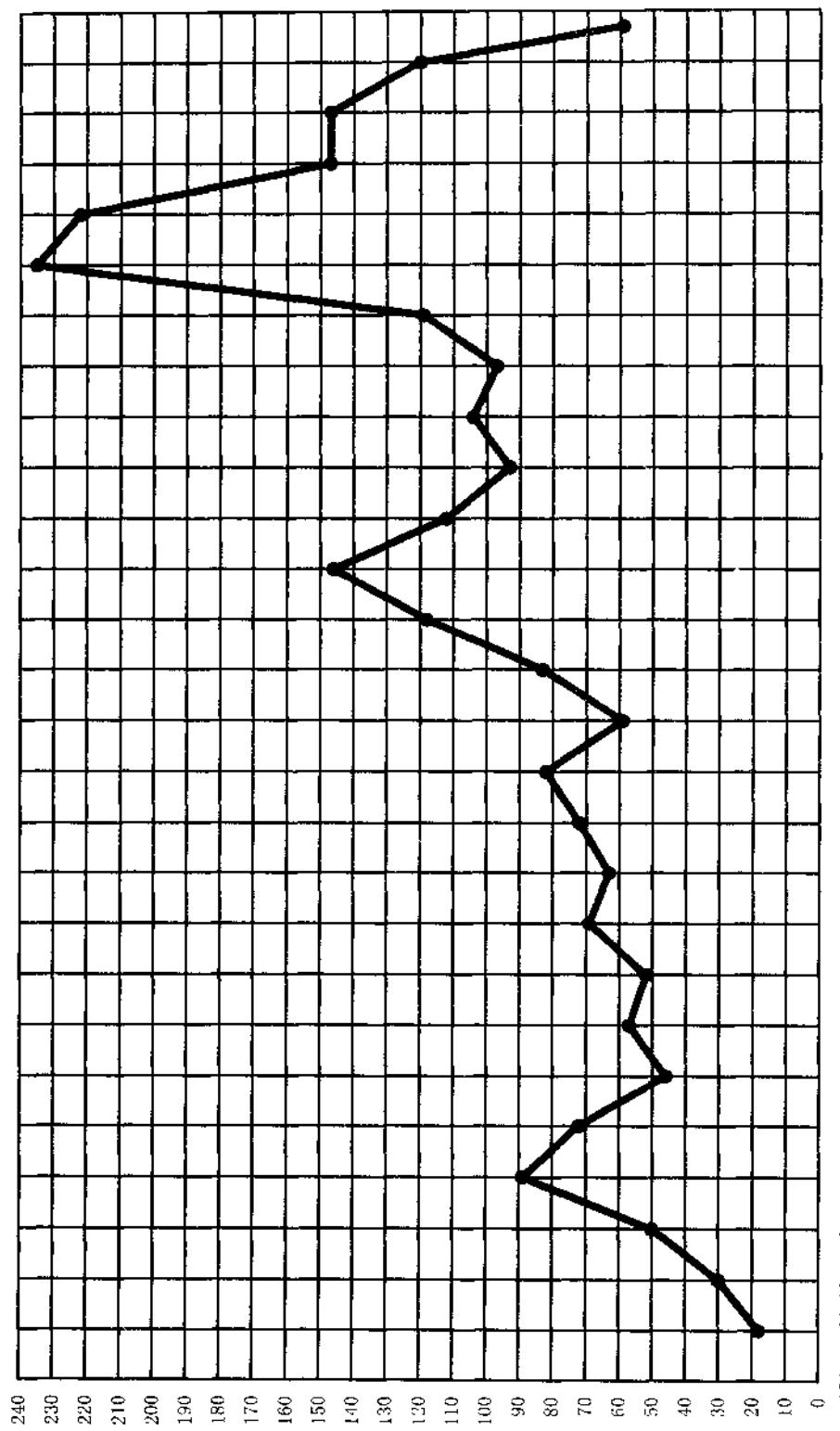
按上述设计，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统计结果。

表1 各时段游幕士人数量统计表

序号	时间段	游幕士人数量	位次
1	1644~1653	18	23
2	1654~1663	30	22
3	1664~1673	50	20
4	1674~1683	89	11
5	1684~1693	72	14
6	1694~1703	46	21
7	1704~1713	57	18
8	1714~1723	52	19
9	1724~1733	69	15
10	1734~1743	63	16
11	1744~1753	72	14
12	1754~1763	82	13
13	1764~1773	59	17
14	1774~1783	83	12
15	1784~1793	118	7
16	1794~1803	146	4
17	1804~1813	112	8
18	1814~1823	93	10
19	1824~1833	104	9
20	1834~1843	97	10
21	1844~1853	119	6
22	1854~1863	235	1
23	1864~1873	222	2
24	1874~1883	147	3
25	1884~1893	147	3
26	1894~1903	120	5
27	1904~1911	59	17
28	游幕时段不明者	41	

表1系根据1323名游幕士人的相关资料统计而得。另有41名游幕士人因难以确定游幕时段，未作统计。为便于分析，同时也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清代士人游幕兴衰变化的情形，我们把表1第三列的27个数字用曲线图表示如下。（见图1）

图1 根据表1制作的不同时段游幕土人数目变化曲线图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这样几点：

1. 士人游幕并不是从清初一开始便很兴盛，而是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时段，即顺治元年(1644)至十年(1653)，有18名游幕士人；第二个时段，即顺治十一年(1654)至康熙二年(1663)，有30名游幕士人；第三个时段，即康熙三年(1664)至十二年(1673)，有50名游幕士人。此后一个时段，游幕士人数量继续大幅增长，并出现士人游幕的第一个高潮。这说明，清代的士人游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兴盛起来的。顺治统治期间，游幕士人还比较少，而到康熙初年，为数已相当可观了。

2. 曲线图有三个明显的峰头，表明清代士人游幕曾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个峰头出现在第四至第六时段，即康熙十三年(1674)至四十二年(1703)间。第二个峰头出现在第十五至第十八时段，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道光三年(1823)间。第三个峰头出现在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时段，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光绪九年(1883)间。

3. 最后三个时段，虽然游幕士人数量仍很可观，但同第三次高潮相比已大幅度减少。特别是最后一个时段，即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游幕士人数量已不足第二十六时段，即光绪二十年(1894)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游幕士人数量的一半^①。这说明，清朝末年，士人游幕正逐步走向衰落。

4. 在上述三个峰头中，第二个峰头远远高于第一个峰头，而第三个峰头又远远高于第二个峰头。另外，从除去三个峰头以外的其他时段游幕士人数量变化的情况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介于第二、三两个峰头之间时段的游幕士人数量以及第三个峰头过后，其他时段(除去最后一个时段)的游幕士人数量，明显高于介于第一、二两个峰头之间时段的游幕士人数量以及第一个峰头之前时段的游幕士人数量。这说明，士人游幕虽然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都比较兴盛，但前后还是有明显变化的。中期的士人游幕盛于早期，晚期的士人游幕又盛于中期。

游幕士人数量的增减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幕主对游幕士人需求的变化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而幕主延聘游幕士人，表面上看来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实际上深受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士人游幕三次高潮出现的时段，均是清代历史上社会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如在士人第一次游幕高潮形成期间，发生了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以及消灭台湾郑氏政权的战争，从而彻底确立和巩固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在士人游幕第二次高潮形成期间，清朝统治进入强盛，又由强盛逐步

^① 最后一个时段游幕士人统计数字的减少，与该时段不足十年有关，不过，从曲线的走向看，游幕士人数量下降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走向衰落。经济、文化长时期内保持着高水平的发展,但从乾隆后期开始各种社会问题亦日渐暴露出来。对内、对外战争不断,如平定金川的战争(1771~1776),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战争(1787~1788),臣服缅甸的战争(1766~1770),臣服安南的战争(1788~1789),两次攻占廓尔喀的战争(1790~1792),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战争(1796~1804),平定南部沿海蔡牵等起义的战争(1800~1810),等等。在士人游幕的第三次高潮形成期间,则不仅发生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捻军起义和西南、西北等地少数民族的起义,而且屡屡发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清王朝的统治迅速走向衰落。

两千多年的幕府发展史总是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即每当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或是一个王朝的统治走向崩溃之时,便是幕府发展极为兴盛之时,如汉末至六朝时期、唐末五代时期。因为这个时候,地方实力派人物往往乘势而起,通过延揽才识之士扩大自己的影响,扩展自己的势力,而士人也把这个时候视为实现其经世抱负的大好时机,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清代士人游幕三个高潮的出现,与上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振荡,毫无疑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清代士人游幕的前两个高潮分别出现在清朝统治彻底确立和清朝统治虽走向衰落但还比较稳固的时期,并且上述历史事件主要发生在边远地区,在广大内陆尚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比较兴盛。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分析,士人游幕高潮的出现,与上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何种程度,可以不可以说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导致士人游幕形成高潮的最主要的因素?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游幕上人的幕中活动进行细致的分析,看看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游幕活动主要是些什么,这样,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将在本项研究的第四部分,专门对清代士人的游幕活动进行考察,然后再来解答上述问题。

三、家境与功名

——影响士人游幕的两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清代会有大批士人游幕?对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解答。比如,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游幕能够使士人在科举入仕无望之后,还有机会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施展自己的经世抱负。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处理行政事务没有多少关联,因而使得那些由科举入仕的官员不得不通过延请幕友来助其处理政事,等等。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这些判断的正确性,但我们却无法采用计量手段对此进行研究,并得出相同的

结论。不过,我们注意到,上述解答主要是从分析游幕能够给士人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和幕主为什么要延请幕友这两个角度作出的,而不是从游幕士人自身的状况出发,去分析他们为何要去游幕。显然,对后者进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揭示士人游幕的最基本的原因。

游幕士人的自身状况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家庭状况与功名状况。游幕说到底是一种寄人篱下的行为,因此,不是万不得已,士人一般是不会去游幕的。而大量史实也表明,士人游幕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家境贫寒,或是科举入仕受挫,两者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一般情况下,士人如果没有功名,就不会有富贵,但有功名也未必就一定有富贵,只有那些获得较高功名,并被授予较高官职的人,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保障。上述分析是否正确,我们可以通过对游幕士人家庭状况与功名状况的量化分析来判断。

1. 游幕士人的家庭状况

分析的重点是游幕士人的家庭出身,主要是游幕士人的父亲从事何种职业,同时注意其家庭贫富状况。另外,对游幕士人中是否较多地存在着直系亲属(主要是父亲)早逝的情况也将给予足够重视,这是因为,男子在传统的家庭中是主要的支撑力量。一旦父亲早逝而子女年幼,他们的命运往往会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他们以后生活道路的选择。以下是有关的统计。

表2 根据父辈职业所做的游幕士人家庭出身状况统计表

家庭出身	官宦	教书	业农	经商	游幕	行医等	仅知未仕	无记载	合计
出身各类家庭的游幕士人人数	278	34	14	45	51	12	439	491	1364
百分比例	20.4%	2.5%	1.0%	3.3%	3.7%	0.9%	32.2%	36.0%	100%

从有史料记载的游幕士人的家庭出身看,他们的父亲以做官者最多,占20.4%;游幕者次之,占3.7%;经商者再次之,占3.3%;其下依次为教书者2.5%,业农者1.0%,行医者0.9%,等等,后五项合计只占11.4%。此外,尚有32.2%的游幕士人的父亲仅知未仕,而无具体的职业记载;更有36%的游幕士人的父亲从事何种职业,在史料中毫无记载,两项合计共达68.2%。

按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家族中若有入为官,则后人一般都要于其传记中载明,以示荣耀,即使是微职,乃至虚衔,也不会忽略。因此,20.4%的游幕士人出身于官员家庭,是一个接近实际的比例。也就是说,在68.2%的家庭出身不详者中,应该没有或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员家庭,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家庭应该是典型的“耕读之家”。他们的职业主要是教书、业农,其次是游幕、经商、行医等等。这样,非官宦家庭出身的游幕士人所占的比例,就应该接近11.4%与68.2%两项合计之和,即79.6%,也就是说,大约有80%的游幕士人出身

于非官宦家庭。

教书和业农在下层士人中是很普遍的,这类家庭的生活水平绝大多数在一般或一般以下。因而他们的子辈常有为谋生计出游幕府或从事其他行业者。商人家庭出身的士人,总给人一种家境富裕的印象,因而他们大可不必为谋生计而出游幕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史料的记载,在上表的 45 个商人家庭中,属于贫寒或家道中落的有 20 个,明确记载家境富裕的只有 1 个,另外 24 个商人家庭的贫富状况则没有明确记载^①。而在这 24 个商人家庭当中,应该还有一些是属于寒素之家。由此可见,父辈经商、子辈游幕的家庭,贫寒或家道中落者是占有相当比例的。此外,父辈游幕、子辈亦游幕的家庭,绝大多数属贫寒家庭,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从表 2 可以看出,这类家庭所占比例不容忽视,说明游幕职业存在着一定的继承性。

对出身于官员家庭的士人来说,如果父亲所任官职较高,那么由于收入状况良好,他们出游幕府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如果父亲所任官职较低,那么由于收入微薄,他们很难给予辈留下足够他们维持生计、支付包括科考费用在内的各种费用的财产,这样,他们的子辈游幕谋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据此,表 2 中 20.4% 的游幕士人的父辈为官的情况,就应该以担任低级官职者为多。实际的情况如何呢?请看下面的统计。(见表 3)

由表 3 可知,游幕士人的父辈所任官职以文职地方官为主,武职只占 4.6%。文职地方官中,七品以下的低级官员如知县、教谕、训导等占了大部分;另有一些京官,也是以六、七品官员为主,如主事、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以及国子监的一些官员等。而中、高级的京官和地方官只占一小部分。这证明我们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在《清代士人游幕表》所收 1364 名游幕士人中,有史料明确记载其家庭状况为“饶于资”、“雄于财”的,只有 13 人,不到 1%,其中包括 5 个官员家庭;而明确记载家庭状况为“极贫”、“贫寒”、“贫甚”、“中落”的多达 399 人,占 29.3%,其中包括 76 个官员家庭。由于史料的缺失,实际的数目肯定要比这高。不过,这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已经表明,在官员(尤其是低级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家境并不富裕,因而其子辈不得不通过游幕等途径来谋生。

表 3 游幕士人父辈所任最高官职统计表

京 官		地 方 官				武 职	
官职	人次	官职	人次	官职	人次	官职	人次
大学士	1	总督	4	道员	10	提督	2

① 据《清代士人游幕表》统计。

清代士人游幕表

京官		地方官			武职	
侍讲学士	1	巡抚	8	知府	13	总兵
尚书	1	布政使	4	同知	12	提举
侍郎	4	按察使	7	通判	3	副将
太仆寺卿	1	提督学政	5	知州	11	守备
太常寺卿	1	都转盐运使	1	州同	1	巡检
少詹事	1	织造	1	州判	2	
郎中	3	布政使理同	1	知事	1	
员外郎	1	布政使仓大使	1	知县	50	
主事	7	金事	2	教授	6	
中允	1			学正	3	
内阁中书	2			教谕	25	
掌院学士	1			训导	19	
翰林院编修	3			主簿	5	
翰林院检讨	2			县丞	3	
左春坊右庶子	1			典史	4	
国子监祭酒	1					
国子监监丞	1					
国子监典籍	1					
国子监典簿	1					
小计	35	小计	34	小计	168	小计
百分比	12.6%		12.3%		60.6%	
合计 250 人, 另有任职不详者 27 人, 两项相加共计 277 人						

在分析游幕士人的家庭状况时,不能不考虑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对士人出游幕府的影响,如遭遇大乱家产丧失、育系亲属过早死亡,等等。特别是父亲的早逝,很值得注意。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家庭中,父亲是主要的支柱,不仅要抚养子女,而且要赡养老人,有各种各样的开支需要他设法支付。因此,在一个由祖孙三代人组成的普通家庭中,一旦作为儿子的父亲过早去世,整个家庭就将陷于困境,不仅老人的赡养成了问题,更主要的是,由于子女年幼,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将很有可能从此改变。他们的生活会因父亲的过早离去而变得艰辛起来。他们不仅要逐步承担起赡养祖父母和母亲的义务,而且要为自己的前途,尤其是为

次次参加科举考试准备足够的费用。为此,他们就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

在清代游幕士人的传记资料中,可以找到许多描述他们过早失去亲人的词语。如“三岁而孤”、“幼失怙”、“少孤露”、“少孤”、“幼孤”、“父早逝”、“父死三月乃生”、“少孤贫”、“三岁而父歿”、“年十五而父歿”、“早失怙恃”、“生数岁而丧父”、“幼孤贫”、“襁褓失怙”、“少年丧父”,等等。从游幕士人一方看,这些记载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即“幼孤”与“少孤”。《礼记·曲礼上》云:“人生十年曰幼,学。”郑玄注云:“名曰幼,时始可学也。”因此,幼孤实即十岁之前丧父,《礼记·曲礼上》又云:“二十曰弱,冠。”“弱”指年少。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人,故有“弱冠”之说。因此,“少孤”实即十岁以后至二十岁之前丧父。

表4 游幕士人丧父情形统计表^①

丧父情形	幼孤	少孤	无明确记载	合计
游幕士人数	93	84	1187	1364
百分比	6.8%	6.2%	87.0%	100%

由表4可知,有6.8%的游幕士人幼年丧父,6.2%少年丧父,两项合计为13%。直系亲属早逝与否,并不像他们曾经获取某种功名或曾经担任某种官职一样,为传记的撰写者所特别注目。获取功名或入仕为官是一种荣耀,一般是要写入传记的;直系亲属的早逝,只会给子女和友朋带来痛苦,不一定要写入传记之中。因此,史料中对游幕士人直系亲属死亡情况无明确记载,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遭受“少孤”或“幼孤”的痛苦。由于受医疗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古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高,在没有史料明确记载直系亲属死亡情况的那部分游幕士人当中,必有相当一部分有过幼年或少年丧父的经历。这就是说,游幕士人在幼年或少年时期丧父者,肯定比13%这个比例要高得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说明幼年或少年丧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家境的变化,是导致士人以游幕为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游幕士人的功名状况

在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念系统中,入仕为官居于首要位置。因此,参加科举考试获取高级功名,就成为士人入仕之前不断追求,乃至终身追求的目标。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士人还是难以如愿。即使有幸获取了高级功名,也因官缺有限,未必能够即刻入仕。于是,为了谋生,或者为了满足某方面的需求,他们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或终生去从事别的职业,如教书、游幕、经商等等。

科举考试的功名可以分为三级:

^① 对于“父早逝”、“孤贫”等情况,本项统计一律按“幼孤”处理。

最低的一级，即所谓诸生，又称生员或秀才，包括廪生、增生、附生等，主要为童生经过院试而产生。

中间一级即举人，为诸生应乡试中榜者。未中举人而获五贡出身者，级别近于举人。五贡为：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

最高一级即进士，主要为举人参加礼部试中式者。

此外，又有监生，即国子监的学生。在清代前、中期主要通过挑选产生，至晚期则多由捐纳而得，其级别与诸生同。

士人能够获取那一级功名，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与命运，尤其是他们能否步入仕途，或者能否被授予使他们满意的官职。而一旦他们不能通过科举考试得到入仕机会，或虽有入仕机会而不能获得合适的官职，他们便会一面从事别的职业，以维持生计，一面继续在考场上努力。

按照一般的推断，游幕士人应以科举入仕受挫者为多，而在科举时代，不能获取进士功名，便意味着科举失败，故游幕士人中应当以中、低级功名的获得者和无功名者为多。获取进士功名的人，一般是很少去游幕的。那么，实际的情形如何呢？下面我们就对《清代士人游幕表》所收游幕士人的功名状况进行一些量化分析。统计工作按下面的设计进行：

1. 按游幕士人出生年代的先后，以每10岁为一年龄组，对各组内每个游幕士人的功名状况进行统计。

2. 对于生年不详而卒年明确的游幕士人，依其获取最终功名的时间，以及游幕时间等相关资料推算出生年龄。根据张仲礼的研究^①，清代士人获取各类功名时的平均年龄如下：

- (1) 进士及第时的平均年龄约为36岁。

- (2) 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为31岁。

- (3) 生员取中时的平均年龄为24岁。

- (4) 贡生中，岁贡生获得的平均年龄约为40岁；拔贡生、优贡生入选或获衔时的平均年龄约30岁；副贡生为乡试末中，但其成绩列入副榜的人，故其中榜平均年龄与中举差不多，约为31岁；恩贡生乃逢国家盛典时，皇帝赏赐的贡生，何时获赏并无一定，故士人获此恩典时的年龄难以估计。

- (5) 监生多以捐纳而得，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在考生屡试不中后才走捐纳一途的，他们获监生衔的平均年龄比获诸生衔的平均年龄大，约为27岁。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92~136页。

推算出生年龄即以上述研究成果为依据。

3. 本项统计的目的在于揭示士人功名的高低与他们出游幕府的关系,故对士人功名状况的统计以其游幕期间所获最高功名为准,而不是以其参加科举考试最终所获功名为准。

从《清代士人游幕表》可知,在入清后出游幕府的士人中,生年最早的一位是谈迁,出生于1593年;最晚的一位是费树蔚,出生于1884年,时间跨度为292年。以10年为一个年龄组,可以分为30个年龄组,其中最后一个年龄组仅有2年。为使各组均以10年为一组,我们将第一个年龄组的开始时间提前8年,即从1585年开始。各个年龄组的游幕士人游幕期间的功名状况如下。

表5 清代士人游幕期间功名状况统计表

序号	年龄组	游幕期间获得各类功名的游幕士人人数								合计
		进士	举人	贡生	诸生	监生	无功名	无记载	未统计	
1	1585~1594				1		131	45	307	1364
2	1595~1604	1	1							
3	1605~1614	1	2	1	4					
4	1615~1624	2	1	1	13	1				
5	1625~1634	3	2	2	13	1				
6	1635~1644	3	1	1	11	2				
7	1645~1654	3	4	2	4	2				
8	1655~1664	3	5	2	6	1				
9	1665~1674	3	2	2	5	1				
10	1675~1684	2	5	6	7	2				
11	1685~1694	4	3	1	6	2				
12	1695~1704	5	5	4	12	2				
13	1705~1714	3	6	9	2	2				
14	1715~1724	9	6	1	2	1				
15	1725~1734	9	10	4	9	1				
16	1735~1744	7	6	2	7	4				
17	1745~1754	10	7	7	9	2				
18	1755~1764	9	19	5	12	5				
19	1765~1774	6	12	12	14	1				